

文湘芷先生傳（1878--1925） 文席謀撰寫，1987.11.原作.2004.8.校正。

出身寒微。苦學成名。書生報國。餘韻流芳。後記。參考文獻。附錄。註釋。

出身寒微。

先父文公啟蠡，字定源，號湘芷。原號湘浦、因避宣統溥儀諱而更改。湖南醴陵人。生於前清光緒四年夏曆六月十一日（1878年7月10日）。根據醴陵石羊族譜，他為北宋名臣文彥博（1006—1097）第二十六代孫，世代多務農。他伯父元輔（字佐卿）天資優異，靠自學成為當時醴陵縣有名儒生，著有《禮文匯》及《宜民錄》等書，見稱于縣誌人物表，因去世很早，家道中落。他父親元選，字香園，號瑞菊，因子女眾多，日食困難，率領兒輩墾田築室。那時山坡地還很多，開墾的田地例無田賦，一家男耕女織日向小康。元選兼習醫術，活人濟世，地方聲望高，尊稱為菊四公，著有《一指禪外科驗方》一書傳世。事跡見稱于縣誌人物表。湘芷母親出自本鄉陳氏，聰明幹練，賢淑慈祥，帶女兒媳婦紡紗績麻，操持家務。湘芷在這環境長大，童年大部份時間在家中開設的藥店協助檢藥製藥。直到十四歲左右才要求放棄藥店工作，立志專心讀書求上進，獲得他父親同意，從此發展，改變他的一生。只可惜英年去世，實際年壽尚不到四十七歲，應世時間不過短短十五年。遭逢清末民初最亂世，有很多不如意事發生。雖成為當時知名人物，做了不少有益于社會國家的工作，但遠沒有發揮他的才能和抱負。去世後，他摯友傅熊湘替他撰寫墓誌銘、劉宗向為他撰寫墓表、劉約真為他在縣誌中立傳。文氏族譜及南社刊社友錄中，都有他傳記。他部份詩文收錄于友朋替他整理的《文湘芷遺集》中。本文是參考上述資料，並根據他摯友(席謀岳父)張羽翹1951年至1955年旅臺期間口述資料，加以考證，記述他的一生。

苦學成名（1892—1908）

湘芷十四歲左右還是一失學少年，突然立志向學。近因由於與一表兄因細故爭吵、受了母親呵責、用上進來發泄內心抑鬱。遠因是他伯父是當地有名望的讀書人，去世後家中藏書無人閱讀整理，他父親時常為此嘆息。無意間使他早已萌起振興家業的責任感。因他小時受過伯父短時啟蒙教育，唸過《雜字》。《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幾本書，在藥鋪中對一些本草藥名已耳熟能詳。他對面前學海多深多廣無所知悉，敢於嘗試。他以自學開始，遇有疑難便向附近村塾湯蘭皋老師請教。久之老師對他的聰慧毅力與進步大感驚異，專程去看菊四公，面前稱讚湘浦，認為值得造就。菊四公最先以為兒子只是一時賭氣，未必認真上進。聽蘭皋先生如此一說，便也高興，答應讓他專心讀書。

從此湘芷正式從湯師上學。很快讀完（幼學），（四書），（五經），（唐詩）等書，還練習作詩和寫八股文，練‘館閣體’小楷字，那是應科考試的字體，整齊勻稱，一筆不苟。湯老師後來發現這學生的程度已超越自己，加上一意氣上原因（見後述）便自動請辭，湘芷如是到縣中其他宿儒如丁滌如、凌跋柵、胡俠亭等師處就讀。從此眼界日闊、進境日大。在1899年便以高名次通過縣考。翌年去省城長沙考上秀才。這是前清科舉制度下的起碼「功名」。漸漸在縣中建立相當名望，結交同輩士子名流，如傅熊湘、袁雪安、卜式藩等。

隨後他獲得縣中公費名額，即所謂‘增補廩生’，在縣學淶江書院繼續讀書，準備參加舉人考試。那時淶江書院的主事（亦稱山長）是當時湖南有名的宿儒益陽縣蕭

大猷。同學也都是醴陵當時俊彥，很多成為隨後幾年事業上朋友，除上述傅熊湘等人之外尚有寧太一、劉今希及劉約真兄弟，湯筱春，劉少樵，文牧希，張羽翮，湯濱南，湯芸臺等。當時士子都只能以科舉為進身之階，湘芷已獲初步成功。就在那時神州大陸發生亙古未的大變化，清室在列強不斷侵略下極度衰頹。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為了救亡，知識份子有主張革命的，也有鑒于日本君主立憲的成功。主張就清廷古老架構而加以改造的。民間哥老會在各地大肆活動，滿清大臣看出老式科舉取士的教育制度不適合當時需要，最顯然的例子是東鄰日本1953年在西方砲艦威脅下改變舊有帝制；拋棄古老道具，斷然有選擇地採用西法，獲得成功。於是‘廢科舉’‘興新學’成為當時急務，但事實上還是經過兩個階段才完全決定。1898年光緒戊戌政變時首先上諭發佈，變法失敗後慈禧主政，即被取消；直到1901年再度發佈上諭，于1904年辦完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科舉的廢除是一重要關鍵。之前，讀書人只有一條狹窄的科舉功名道路可走；名額少、標準苛嚴，知識內容陳腐貧乏，限於呆板的八股文體，不重義理，不能選拔真才實學。之後，路途多，範圍廣，各種普通及專科學校，包括講武堂及軍官學校等，在各省紛紛成立，國外留學之門也大開。貧困的可以進公立，富有的可以進私立。士子如打開閘門的水庫，萬馬奔騰，舊學慢慢式微，代之以新學和洋務。湘芷順應潮流改弦易轍，于1902年考入湖南省高等師範學堂，該校後改為湖南優級師範，由前嶽麓書院改制而來，為湖南大學前身。次年考入京師大學堂，該校為當時國內最高學府，即北大的前身。他以英文理化為主科。那時國內新學制還未建立基礎，教材缺乏，京師大學堂大部份新學制教材採用日文原本。湘芷一改以往所學，理科基本課之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要從頭學起。還要鑽研日文、英文，學業的繁重可想而知。他在1908年京師大學堂畢業後獲授舉人，分發郵傳部。雖然以後還是常手不釋卷，正式讀書生涯到此為止。綜合言之，他自1892年十四歲起到1908年京師大學堂畢業止，短短十六年，由一失學青少年把中國古書讀好，經過八股文的磨練，取得「秀才底子」又接受新教育達當時國內最高水準的造詣。思想方面，接受了革命思潮，成為革命黨員，隨後工作更為積極，開展他書生報國宏願。京師大學堂畢業後三年，便是民國肇始。

書生報國（1910—1925）

湘芷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分發郵傳部工作，事實上並沒有去郵傳部，可能由于下述原因：1.他以往在湖南高等師範學堂念過一兩年，可能早有獻身教育的打算。可能他已意識到新舊學制有一時期青黃不接，教育革新要做的事很多，人才很缺乏，使他有強烈的責任感。2.他對郵傳部缺乏瞭解、沒有人事淵源。見到清廷腐敗而不在意其任命。3.在教育界工作可以回到湖南，就近可照料老家。所以畢業後在北京湘學堂及黑龍江齊齊哈爾中學工作一段時期後便回湖南投身于教育界。在民國初幾年內他擔任過省級教育行政工作，如督軍府的教育科長，擔任過湖南第一師範，長郡公學，及含光女中等校校長。含光女中是他創辦的。之前他還擔任過長郡中學及湖南高等師範學堂的教務主任及兼任教席。在他去世前的十幾年中他和當時湖南一班教育界前驅者（註九）辛勤工作為湖南教育打下良好基礎，包括學風的培養，學制的建立，教材的編審，師資的培訓與延攬，以及術業的傳授，成為當時湖南教育界中堅人物之一。他所講授的課程，在北京湘學堂教數學，在湖南教心理學、

論理學，避亂鄉居授徒時教國學，他為當時‘南社’會員。有時參加雅集，以詩文會友。

在湖南他雖以教育為安身立命之所，但有時離開教育崗位。主要是為了反抗當時北洋軍閥在湖南的殘暴統治，積極參與驅暴工作或逃避軍閥的捕殺。民國初年湖南政局有三度為北洋軍閥所掌握，即袁世凱支持的湯薊銘任內，段祺瑞支持的傅良佐任內，與吳佩孚支持的張敬堯任內（註十）都是橫征暴斂，濫殺無辜，湘人恨之入骨，多敢怒不敢言。惟有教育界連同一些知識份子首先發難，先以集會及書報對軍閥口誅筆伐，並連絡省內外進行反抗，促組地方武力保衛鄉里。墓誌銘中所謂「...促諸州起兵拒之...」就是講這回事（附錄一）。湘芷和一班教育界朋友如胡子靖、彭國鈞、傅熊湘、劉今希等深為軍閥所忌憚，派人捕殺，湘芷幾次在萬分危殆的關頭幸得朋友或學生通報或及時救助而逃脫。

與反抗軍閥連帶而來的工作對兵變後災區的善後與賑濟。1918年初北洋軍閥以十餘師兵力大舉入湘，與湘、粵、桂聯軍在岳陽攸縣等激戰。北軍主力盤踞醴陵、攸縣等地，誅求無數；撤離時大舉燒殺，醴陵災情慘重。湘芷和傅熊湘、劉今希等將災區拍攝照片，同時集各報章雜誌有關災情的報導，撰寫專文。編成《湘災紀略》、《湖南雜誌》、《天問週刊》、《醴陵兵燹圖》、《醴陵兵災紀略》等書刊，公之於世。同時在很多場合講演揭發軍閥暴行，配合賑災捐款，加強驅張（敬堯）行動。1919年2月上海舉行的南北和會中，湘芷和傅劉等三人代表湖南軍方參加，在會中展出上述資料，痛陳北軍在湘暴行，湘芷聲淚俱下，獲得廣大同情。隨後張督之去位與此有關。此事在墓誌銘及縣誌中有生動記述。

湘芷在地方糜爛之後也曾短時參與重建工作。1916年，軍閥湯薊銘離湘後，湘芷回湘初任高等師範學堂教務長，校長吳嘉瑞是他的好友，出任改組後督軍府的民政廳長、堅請湘芷襄助（任民政科長）。後來調出到安仁縣任縣知事，但不久又離去。雖時間不久，但獲得地方愛戴，譽為當時最好的縣知事之一。1925年秋、安仁仕紳不知他已去世、推派代表到他醴陵老家，打算徵得他的同意後去請願推舉他出任改制後安仁縣長。

1914年，唐繼堯與蔡鍔雲南首義討袁護法的稍前，湘芷朋友袁雪安（唐、蔡日本留學時同學）任雲南財政廳長，邀湘芷去雲南任通海釐金局長，幫他建立制度，也為避離省內軍閥的迫害而暫離。但為時不久便返湘，回到教育崗位。關於上述籌組地方武力與北洋軍閥對抗，事實上後成為湖南主席的何鍵，就是這種風雲際會環境中興起的。那時何鍵自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不久回鄉，遇到這情況，即以組織游擊隊起家。民國十三年（1924年）正式參加湘軍編為第四師所屬的第九旅，何鍵任旅長。最初湘芷只是以朋友立場，協助何鍵規劃、延攬人才、建立聲望。而何鍵當時確也是從善如流，以抗拒北洋軍閥保衛鄉梓為己任，為人民愛戴。湘芷1923年起短時在何鍵軍中任事，直至去世。1925年何鍵部隊駐紮在湘南永興縣，湘芷在軍中任事，參贊軍務，並協助對外連絡。那時全國廝戰，各方同意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孫總理自廣州起程北上，準備出席。湘芷受命為湖南唐生智軍方代表，正擬起程，突然起病。先到長沙醫治，傳記中謂誤于庸醫，病情惡化。轉回醴陵，瞳孔擴大畏光，但精神健旺，頭腦明晰。自知不起，對自己才能未充份發揮，著述計劃未實現、非常傷心。悲哀地說：“若有扶乩之事，將藉乩筆寫出胸中蘊蓄。”他一一安頓後事，唸出他自輓對聯，上聯『一水迴環，隨人清濁』，下聯『雙丸鉤轉，成我古今』，溘然長逝。留下夫人和五子四女，頓失依靠；生

活淒苦。直到兒女漸漸長大。他的夫人是同縣何福隆先生之女，慈祥而個性堅強，在困難中將兒女教養成人。于1938年去世。

餘韻流芳

傅熊湘先生為湘芷撰寫墓誌銘，劉宗向先生為湘芷所撰墓表，與劉約真先生在《醴陵縣志》中為湘芷所立傳記，對湘芷的身世與為人簡明敘述；刻劃出湘芷令人難忘的特性。三者附錄于本傳之後以供參考。墓表在文革時被毀，幸從劉宗向先生著作中錄得。張羽翮先生于1951年至1955年旅居台灣時，對湘芷深刻懷念，流露于閑談嗟嘆之中。他也談述一些湘芷有趣而鮮為人知的遺聞軼事。為敘述湘芷的為人，簡單地摭摘自他友人文章中的句語作為寫照，如下：

「君富天才，于事無所不辦；為學務實踐，于端士習，厚民俗，尤競競致謹，遇人和易而律已甚嚴。……」「居官廉、校士勤、急國家朋友之難勇，事有不勝其敘者。」「性廉謹，節嗇治生，兼贍其兄弟，孝友出於天性。」「有惠政，積勞致疾……厄于命，窮于年，齎志以歿。」「其光熊熊，其氣魂魂……。」

湘芷上述品質特性的形居與他的家庭環境，出身及時代背景有關。清末內地農村閉塞純樸、人民承襲孔孟舊道德標準。知識份子接受新舊雙重教育，有感于國家民族的危亡，激發高度愛國情操和救亡使命感。在湖南，那時曾、左、彭、胡等鄉賢謝世未久，對青年人具有典範作用。黃興、蔡鐸、宋教仁等為他們同時代人而彼此具有交誼，在思想和作風方面深受影響。下面軼事九則大部份為張羽翮先生所講述，也有吾弟席薰自滿叔定韶口中聽到轉述的，也有我幼時從母親及兄姊處聽到憑記憶寫下來的。

一·湘芷十歲在近鄰湯蘭皋老師私塾讀書時，鄉人有賭他設法自老師處賺一紅包，則允代勞完成他的某一份內勞作。他某日黃昏趁他父親菊四公未在家，打扮為一‘遊學先生’，頭戴風帽、肩揹包袱到私塾拜訪。當時私塾老師作興以對聯試探遊學士子才學，兼有為難之意；蘭公關上柵門出一聯語向來者囑對，出聯：「門內有才，閉門不納無才子」。他稍加思索對曰：「駐旁有馬，駐馬何須問主人」。蘭公認為是妙對，開柵門迎入，談話片刻興辭。主人照例賞了紅包。後來蘭公獲知其事大為生氣，菊四公率子謝罪，仍然不釋，湘芷祇好轉到凌跋栴師處就讀。

二·湘芷于1900年中秀才後，曾扮作一游學先生到同鄉各處私塾游學訪問藉以切磋學問，增長見識。某日到南鄉某地私塾，有一老學究出聯屬對，上聯為：「初一元旦，十五元宵，一月兩元分晝夜」湘芷對以「戊戌閏三，庚子閏八，三年二閏判春秋。」主人認為妙對，賞以紅包，優予款待。按：戊戌年為光緒廿四年（1898），庚子年光緒廿六年（1900），閏三月閏八月皆為事實，且時隔不久。巧事巧思、堪稱難得。三·湘芷國學基礎深厚，工駢體文，後來接受新式教育，學習數學，論理、心理等科學因而長于析理，在長郡公學任校長時，學生偶有風潮事故，湘芷輒以一紙牌示文告，文辭典雅，析理明暢，學子成群搖擺誦讀，低徊偃服，問題均能因此解決。

四·湘芷工對聯，民國八年在上海時所作輓宋教仁夫人一聯：「一病臥滄江，看罷夫婿仇讎，大陸龍蛇都歷劫」；『重泉見漁父，話到家山烽火，桃源雞犬已無多」；傳誦士林。按：上聯指刺宋案有關指使人及兇手包括袁世凱、趙秉鈞、武士英等那時都已死亡或服誅。下聯指時張敬堯時任湘督，殺人如麻，各縣雞犬不寧，漁父為宋教仁別號，桃源為宋故鄉，此聯敘事洽切，音調鏗鏘。

五·1906年同盟會與哥老會聯合策劃的萍鄉，醴陵，瀏陽三縣革命運動(反清前後第九次)失敗，醴陵參加的人很多，為縣府扣押，時湘芷正在京師大學堂，因與當時醴陵知縣汪文溥(字幼安)友善，為分析當時國內情勢，力勸免興大獄，被捕者多賴以活命。民國八年湘芷在上海見到幼安，舊事重提，贈詩盛讚其德。註明：『公宰醴陵適萍醴革命事敗，多所全活...』此事詳醴陵縣誌民國版、政績錄、汪文溥條。此詩收錄于湘芷遺集，為便后人易于解，以白話試譯于附註十一。

六·張羽公說過：『何鍵在湖南的興起得力于湘芷的相助，尤其在建立知名度與羅致人才兩方面，有如蕭何之助劉邦。他的早逝是何鍵一大損失。假如湘芷能多活若干年，何鍵手下人才結構可能不同。湖南知識份子與何健間的合作會好得多。何鍵主湘八年治績也許另是一番景象，間接影響國家前途。湘芷去世不久，何鍵原先得力助手如吳凱南，吳南孫等相繼離去.....』。湘芷與何鍵老家邇近、年歲較長，從小交誼深厚，彼此信服。湘芷性廉謹，在教育界朋友多，學生多，因京師大學堂與南社的關係，省外人緣亦佳。才德與聲望都足為得力輔弼。

七·湘芷逝世不久他同鄉摯友中有些怪異傳說，一則是某日傳熊湘先生與幾位朋友扶乩消遣，忽然亡友‘寧太一’烈士臨壇，太一為革命黨人、民國元年為軍閥殺害者。臨壇時首作悽愴語，隨後提到湘芷之死大意謂：‘湘水無情，湘芷死矣.....請代致送此輓聯...’，上聯：「風景不殊，知己終須存海內」下聯：「山河忽異，歸魂何忍望江南」。熊湘謂此聯甚似太一生平口氣。另有一說謂湘芷前世為醴陵南鄉雲岩寺某老僧.....。扶乩以前在文士中盛行，現已解釋為執事者被催眠將潛意識寫出，並非真有鬼神來臨之事。至於老僧轉世之說可能因湘芷臨終說過夢游雲岩寺的事，記得以往湘芷墓道華表刻有他的自挽一聯，旁邊跋文有言：「先君臨終夢至雲岩古刹，並撰多聯，醒不勝記憶，惟憶自挽一聯.....他年化鶴歸來亦長存紀念耳」。上述這些可以想見他朋輩和子孫在他逝後對他懷念的深切。

八·昔日所見湘芷家中藏書、日記、文札等件甚多，在文革時悉被焚燬散失。記得家中懸有湘芷的老師淶江書院主事蕭大猷寫給他的對聯一幅，上聯為「風生野渡河聲急」下聯：「霜落秋郊樹影疏」。蒼勁古樸，堪稱珍品，應是湘芷就讀淶江書院後所獲贈送的。此時想來上聯描寫湘芷民初為北洋軍閥迫害逃情形，後聯描寫文革時老家抄毀，墳墓被破壞時情景；無比恰切，成為讖言，令人倍覺傷感。

九·湘芷京師大學堂同學寧鄉劉容先(字宗向)曾言，民國初年湘芷深感國人在民國以來，舊制度舊思想被破壞揚棄，完整新制度新思想，沒有隨之而建立。以致眾說紛紜，互不相容。人民力量不能集中從事建設，反而互相抵消，誠為可嘆可痛。也許這就是湘芷想以教育來挽救國家，未見其成，耿耿于懷的隱衷。(見註十二)。

後記：

清末民初1870年左右出生的知識份子大都受過科舉教育，國學基礎深厚，受有舊道德的浸融，但因世易時移遭受東(日本)西(歐美)文化的衝擊，新事物的影響，思想發生劇變(見註十二)。一面見滿清腐敗無能，國家受到列強侵略，支離破碎，民生疾苦；原先祇想推翻滿清，便可拯救國家于危亡。但民國成立以後，發現軍閥為害之烈甚于滿清；帝國主義的威協更大，心情沉重，工作更為急切。因科舉廢除了，上進之途增多了，知識份子多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事實上因才華與際遇的不，這一代精英，有拋頭顱洒熱血為國犧牲的、有富貴壽考、或獨善其身的。曾

國藩曾講過，熱心辦事業的人未必是成事業的人，成事業的人未必是享福份的人。湘芷具有特殊天賦，環境埋沒不了他的才華壯苗，反而磨練出他特殊耐力和品德。他對民初湖南教育的貢獻，驅除軍閥為民除害及賑災的貢獻，籌建地方武力保鄉衛國的貢獻；以及向父母盡孝道，為兄弟盡悌道，為朋友盡友道等等；殫精竭力，甚至出生入死，其工作精神與成就早已獲得充份肯定和讚揚。但因英年早逝，他打好的事業基礎未及成為偉業，胸中積蓄未及發抒為偉著，國家上軌道未及身見，臨終自己傷心，朋友及后人也為之傷心。

鈍安先生替他撰寫的墓誌銘，劉宗向先生替他寫的墓表，及劉約真先生為他在縣誌中寫的傳記，文簡意賅，史實價值之外尚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特附錄于後，以供參閱，此外，為增加本文對后代的可讀性，在本文之末加上若干條註釋，其本身具有歷史意義。主要參考文獻名稱條述于最後。

本文作者為湘芷第四子，湘芷去世時他才四歲，對他父親生平事跡所知原屬不多，賴他岳父張岡鳳（羽翹）先生以往口述一些資料加上他弟弟席薰抄寄族譜收錄的墓誌銘與傳記，再加上他世兄劉佛年教授（劉約真先生之子）抄寄縣誌及南社社友傳記資料加以分析整理；以後承黎修榮先生贈送一冊醴陵縣誌民國版，根據其中史實，原稿稍有修訂，對上述資料的提供者均此志謝。

參考文獻：

- 一、醴陵縣誌（民國卅七年版）
- 二、鄭逸梅編，南社叢談及南社社友事略
- 三、醴陵石羊文氏族譜
- 四、劉宗向先生遺著選
- 五、文湘芷遺集
- 六、井上清鈴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

附錄一：墓誌銘(傅熊湘撰)

君姓文氏，諱啟轟，字湘芷，醴陵人也。曾祖大注，祖一彰，父元選。其先世服農，自君伯父以儒顯。君貧而力學，能文章，當清季為名諸生，畢業京師大學堂，授舉人，分發郵傳部，徵用顧非所好。歷長諸校，及省教育科長，知安仁縣事，長雲南通海釐局，終湖南陸軍九旅軍法正，年四十有八，雖獲稍伸其志，固未盡君之才也。為學務實踐，於端士習，厚民俗，尤兢兢致謹。遇人和易而律已甚嚴，節齋治生，兼贍其兄弟。民國七年醴遭兵災，與邑人傅熊湘走上海，請振南北和議。既而湘督所為益橫暴，乃為書共斥其惡，促諸州起兵拒之。事卒得集。方敬堯購君而君父忽召君歸，人爭詛其行，君卒毅然決歸，竟亦無恙，其仁孝蓋平素積然也。君富天才，事無不辦。善為翰藻，有遺集若干卷。以民國十四年卒于家，臨卒誦其自挽云：一水迴環隨人清濁，雙丸鉤轉成我古今。嗚呼，以君之才而厄于命，窮于年，固知其齊志以歿也。夫人何氏生子五人，長席歐，次席守，三席平，四席謀，五席薰，均幼；女四人，長適丁次適湯，餘幼待字。以明年正月十二日葬君于所居對岸月形辛山乙向。銘之曰：文君石羊，自君以彰。蒼頭特起。異才觥觥。勤教力學，譽我髦士。無思不服，其從如水。一行作吏，為軍司馬。克令厥終，雖終不終，遺文有待。人壽何價，四十八載。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銘之萬年，視此磁磚，友人傅熊湘撰並書。

附錄二：墓表(劉宗向撰)

君諱啟蠡，字湘芷。清同光中醴陵有名諸生日元輔先生者，其世父也。先生原本禮經，參稽會典，寫次婚喪祭儀一卷。又撮前儒之說為通論一卷，顏曰《宜民錄》。余嘗擬之明儒呂坤《四禮翼》。呂氏書、禮之本。宜民錄、禮之文。皆雅言也。君未冠繼為諸生。光緒甲辰考入京師大學堂，宣統元年畢業。賞舉人郵傳部司務。去而課士以養。入民國、歷任湖南教育司科長、通俗教育館長、第一師範校長、長郡、含光校長、高等師範教務長。中出知安仁縣，最後官湖南陸軍第九旅軍法正。病歸，乙丑夏四月十三日卒於家，年甫四十有八。君表裡明白，遺外世榮，篤於風義。幼受書元輔先生。稍長，師益陽蕭主事大猷，善詩賦。及革命倡，覆棄所學而從之。薄清命不受者以此。然和而不激、俠而不犯。民國建、喜甚。積歲忽疑，輒嗟曰：革命所獲遂若是乎！乃廣購群經諸史，山居縱讀之。見余治禮，舉《宜民錄》以示。傳曰，禮以守國。又曰禮身之幹。是故披髮野祭，決陸渾之為戎；受賑而惰，測成子之不返。自西力侵清，政窳而政廢，然都邑鄉黨間，禮意猶有存者。元輔先生孤於是時稽古儀文，可謂孤懷夙識，君雖強承家學，而異論方闢，不暇措意。及觀世益敝，嘗宵夜更論，謂其所以如此，皆由不謹於禮。因思致力於本原之學，然猶未亟也。余與君同學共事先後二十餘年，所趨異而相知深。非相見則不樂。然卒之前歲，忽怒余而疏之，私自怪駭。及沒，始悟人久暱且別，則反常。雖骨肉或然。以故君之葬志，出於其縣人傅熊湘。今君之長子家詠修墓，始來求言。嗚呼！述君生平，誠非余莫可也。爰粗次履跡，而重論其有志未逮者，使泐諸阡。庶後世士知君為人具有本末，非淺躁者流也。若乎先世妻子生卒葬域，傳志具矣，不復贅。而其居官廉，校士勤，急國家朋友之難勇，事有不勝其敘者，亦姑略云。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三月寧鄉劉宗向畝園表。

附錄三：醴陵縣誌人物傳七--文啟蠡傳(劉約真撰)

文啟蠡，字湘芷，弱冠入縣學，補增生，旋畢業京師大學堂，授舉人，分發郵傳部任用，先後充湖南第一師範，長郡公學、含光女學校長、湖南省長公署教育科科長，安仁縣知事，所至有聲，居恆寡言笑，其誨人長啟迪，民國七年醴陵遭兵燹，邑里為墟，其冬縣有乞振于南北和會，謀善後，啟蠡與傅熊湘之滬主其事，時張敬堯督湘，所為橫暴，啟蠡曰：是必有以懲之。乃與熊湘搜集報章所載，為湘災紀略，湖南雜誌，天問週刊，及醴陵兵變圖，醴陵兵災紀略等書，並于和議席間，歷陳張敬堯在湘之暴與醴民被災之慘，淚與詞迸，指抵几，振振有聲，聽者為之感動。性廉謹，勤於治生，兄弟八人，悉為置產，有弟婦早孀，啟蠡以己子後之，撫其遺女，畢業大學，父習醫，頗事導引，自言某月某日當蛻化，諭啟蠡速歸，時啟蠡游滬，敬堯購之急，乃變姓名歸，抵家父無恙，其孝友蓋出於天性也。啟蠡游奉天，雲南，長雲南通海釐局，最後為永興令，有惠政，積勞致疾，年四十有八，卒時神識清明，自誦其夢中一聯云：一水迴環，隨人清濁；雙丸鉤轉，成我古今。蓋自輓也。啟蠡工詩文，擅聯語，曾輯論理學以授徒，所著有文湘芷遺集行世。

註釋：

註一：漢族文氏有周文王之後，與陳國公子完（敬仲）之後兩宗。根據醴陵石羊文氏族譜，遠祖為春秋時陳厲公之子公子完，避難逃亡齊國，改姓田，戰國時田完

子孫取代姜氏為田齊。田完在齊諡敬仲，支孫姓敬，避後晉高祖石敬瑭之諱，在公元後936年左右改姓文。

註二：南社、清宣統時葉楚傖，陳去病、柳亞子等在上海所創之文學團體，以詩詞唱和相尚，充滿愛國情操，當時國內名士多為社員。

註三：《雜字》為前清農村啟蒙性讀物之一，約一千余字，為包括當時常用物品的韻文，內容有如：「雜貨鋪店，油臘紙草，良鹽京醬、豆豉胡椒，閩筍木耳……」等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俗稱《三百千》，同為啟蒙讀物，人多知之。此外尚有《幼學瓊林故事》一書，係以駢體文敘述舊時代一切事物，包括天文、地理、歷史、動植礦物、典章、制度、器物等。讀完這書後，便可讀四書五經，甚至十三經。至於史記，廿四史、資治通鑑、諸子百家、其他經、史、子、集都是在讀完四書五經後自己閱讀。在湖南即令一般農民也至少讀完《雜字》，與《百家姓》便於寫數記帳，讀完《三百千》也普通，正式讀書以功名科第為目標者，始讀四書五經以上。以往讀書小時注重背誦，求解倒在次要。年歲稍長，思想開發，內容自然貫通。小時背誦的終身難忘，也都能發揮其益處。

註四：何元文先生《竹莊憶往》一書對清末科舉考試有詳細記述。有一專文收錄于台灣出版之《湖南文獻》季刊第五十三期。

註五：淶江書院為清代湖南著名書院之一，左宗棠曾出任山長。兩江總督陶澍經江西返鄉路過醴陵時，左曾撰聯歡迎：「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大獲賞識、傳誦迄今，按印心石為陶澍家的名勝。

註六：醴陵為湘東山區小縣，清末民初人才蔚起，為鄉里為國家有過重大貢獻，民國元年至卅七年期間謝世而縣誌民國版中有傳記者有下述諸人，可見一斑。文後錄（字代耕），寧調元（字仙霞，亦字太一），劉建藩（字昆濤），蕭昌熾（字松堅），張智（字偉發），李發群（字芋禪），丁洪海（字慧仙，亦字慧禪），蕭翼鯤（字躍鯨亦字含圓），文斐（字牧希，亦字幻圓），潘昭（字式南），潘昉（字靜生），李隆建（字仲莊），廣嘉谷（字鐵岡），李武（字止戈），謝寅杰（字誚莊），謝逸如（字善分），袁家普（字雪安），劉彥（字式南），文啟泉（字湘芷），劉澤湘（字今希），張汝乾（字銘惕），傅熊湘（字文渠，亦字君劍，號鈍安），卜世藩（字芸庵），胡德辰（亦名王杰，字俠亭），李秀楠（字邵農，亦字少文），潘森甲（字菊甫），段觀康（字弼虞），王復（字紀宣），黃鈞（字夢蘊），潘毅（字明誠），李石岑。馬惕冰（亦名卓），朱德龍（字侶霞），邱縉（字語雲），古銘三，朱沃（字懶仙），袁德宣（字浚明），陽兆鵬（字筱垣），劉青燃（字西崖），劉遠蕃（字竹安），劉師陶（字少樵），劉家鑒（字庚生），李莘田（字瀛湘），陳麓芳、唐國儀（字愚醒）左萬盈（字畢卿），羅德瑞、榮錫勛（字咨岳），陳紹東（字鳳沂），謝樹衡（字性廉），彭志澤（字曙冰），蕭方直（字松垣），張翼鵬（字毓鯤，號圓森）張國威（字劍歐），劉克家（號麓前），周希武（字丕烈），晏國濤（字俠僧），劉輔察（字賁予），余湘三（字甲文），溫忠（字百非）葉彧龍（字念先）張際春，程宣，王英成（字永乾），劉宏揚，張空逸（原名毅），謝康全（字嘯風），張毅中（字紹荃），柳漱風（亦名溥泉），李石安，左權（號叔仁），李振文（字嗣書），賀炎煌，劉匯溟，劉漢藩，王芃生（名大楨）。

註七：日本維新的成功與對中國的影響。日本明治改元于1868年，相當于滿清同治七年，那時中國大洪、楊、稔，回戰亂平息，左宗棠不久收復新疆，避為

行省，呈現中興景象。明治自幕府取得下政權，依舊非常落後。中日兩國同受西方勢力的侵略，處境相同但反應與發展則異。雖都認為要學習西方長處，但中國猶豫而遲緩，日本則有選擇的保留中國文化精粹，全力西化。戊戌政變後滿清保守派勢力抬頭，為迷信所誤，以義務團來對會西方勢力，浪費時間，損耗國力，使西化工作停頓，不到十余年時間中日強弱易勢。日本逐漸躋身強國之林，夥同列強轉而侵略中國，猙獰面目較西方帝國主義有過之。這一事實對當時中國士大夫階級刺激太大了。熱心而有識之士，提出各種救亡圖存的主張，大都由這事實的感觸而來的。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得力于明治天皇英明睿智。與滿清的慈禧太后相較高出太多。且由于幅員較小，四面環海，易于產生一安定局面，又因自身文化包袱不重，對東西文化的取舍易持客觀態度，改革時顧忌與遷就之心比較少。又因皇室數百年受幕府鎮的擺布，對採用君主立憲制，皇室心理上易于接納，阻力較小，這些都是日本維新易于成功的因素。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雖曾為中國禍害，但也曾對中國也有好的影響：①清末中國飽受歐美列強侵略，由最初的自大而轉為自卑。看到日本的成功，至少祛除了一些人種上的自卑感。②日本西化時將西方學術資料大量譯為日文，早期日文中漢字佔很大比例，中國學子學習日文遠比學習英法德等西文為易，日本具有橋樑作用，③事實上中國學術上採用的字譯名有大部份採用了日本翻譯，沿用至今，減少了中國西化的困難，④日本民族勤勞守法，整潔務實，團結進取的精神，加上科技上的成就，基於我國「見賢思齊」的古訓，使我們做法而獲益。

註八：嶽麓書院 創建于宋太祖開寶九年（976），與白鹿，嵩陽，應天合稱為宋代四大書院，其他三書院相繼被毀，名存實亡，獨嶽麓書院曆元、明、清而久存。清末興學堂，于1903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民國十五年擴展成立湖南大學。

註九：清末民初湖南教育在內地各省中比較發達，造就出的人才眾多，教育界人士大都品高學優，愛鄉愛國，仗義執言，深受省民敬重，成為湖南省中主要安定量之一，據不完全統計有下述一些人士（以姓名筆劃為序）。文湘芷（一師、長郡，含光校長），文亞文（數學家），方克剛（妙中校長），王季範（長郡，衡粹校長），皮崇石（湖大校長），任邦柱（廣益校長），李士元（周南校長），李維國（楚怡高工校長），李肖聃（國學大師），吳晦華（一中校長），何炳麟（嶽雲校長），胡子靖（明德校長），胡庶華（湖大校長），曹典球（衡湘校長），徐特立（領導勤工儉學留法），陳文瑋（創辦路礦學堂、省高工前身），陳浴新（原名毓炘、湖南講武堂），黃士衡（教育廳長、湖大校長），曾約農、曾寶孫（復湘、藝芳校長），勞啟祥（雅禮校長），彭國鈞（長郡，修業校長），彭鏡芙（長郡校長），彭錦雲（兌澤校長），

註十：民國初年湖南為北洋軍閥與南方革命軍雙方爭奪的要地。省內軍人參與角逐，擾攘不休，概略情形有如下述。

1911（辛亥）年10月湖南新軍起義，推舉焦達峰與陳作新為正副都督，不久兩人被殺，譚延闓繼任湖南都督，程潛任軍事廳廳長。民國二年袁世凱派湯薌銘督理湖南軍務兼按察使，譚延闓調離湖南，程潛被通緝出走，湯秉承袁世凱意旨，根據譚不慎所留名冊對革命黨人大肆捕殺，死者極多，湘人稱之為「湯屠夫」。民國四年底蔡鍔與唐繼堯在雲南起兵討袁，以程潛為護國軍湖南總司令，民國五年二月由黔入湘，六月逐走湯薌銘，推舉劉人熙為督軍兼省長，冬迎譚延闓復任湖南都督。民國五年三月袁被迫取消帝制，五月憂患而死。由黎元洪繼任總統，直到國民六年八

月黎元洪為張勳逼走，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不久解散國會，駐重兵于岳陽，監視南方勢力，任傅良佐為湖南督軍，以資鎮壓；零陵鎮守使劉建藩與湘軍第二旅旅長林修梅通電首義護法，九月推程潛為湘軍總司令，協同粵軍馬濟及桂軍譚浩明所部十月擊敗北軍于衡陽。傅良佐調安武軍六萬人增援，十一月程潛部湘軍擊退北軍，傅良佐出走，程潛收復長沙，被推為湖南省長兼總司令。民國七年一月程潛進軍岳陽。二月北洋政府以曹錕為兩湖經略使，增調第三師吳佩孚，第七師張敬堯，連同張懷芝、李奎元等部號稱十師，分道入湘。程潛率湘軍迎戰于岳陽羊樓司，月餘終以眾寡不敵，湘粵桂聯軍敗退湘南。四月南軍推劉建藩為總參謀長，全面反攻，北軍敗退，劉建藩追北軍至株洲遇伏戰死。南軍撤至攸縣，北軍復振。前後經過醴陵一帶，燒殺擄掠，災情慘重。隨後張敬堯成為湖南督軍，以殘暴手段統治，激起湖南軍民抗暴。六月南軍以何鍵為瀏醴游擊司令，當時北洋軍閥與各省地方武力及南方革命軍，三者若干省內彼此爭奪，但以湖南境內為最烈。到民國八年時軍閥們漸感厭戰。九月湘軍將領譚明浩、譚延凱、程潛等，與在湘北軍將令吳佩孚、馮玉祥等聯名通電主和，民國八年二月廿日南北和議在上海開會（湘芷為湘軍代表之一），民國九年湘督張敬堯殘暴更甚，反對者更為普遍而劇烈，同時北軍戰事也屢屢失利，同年五月吳佩孚被迫率部離湘，六月湘軍趙恆惕的部隊攻佔岳陽，張敬堯逃往漢口。湘軍將領彼此內爭，趙恆惕佔上風，當上湖南督軍，吳佩孚以兩湖按察使的名義駐軍于湖北，在湘雖有挫敗，勢力仍大，利用趙恆惕來控制湖南。趙則利用吳為奧援以對付譚延凱、程潛等的軍力。趙手下有四個師，其中之一為唐生智的第四師。後來唐生智背叛趙恆惕加入國民革命軍，被任為第八軍軍長，何鍵為第四師師長，吳佩孚又利用湘軍葉開鑫攻打唐生智，遭到失敗。唐生智在北伐攻佔鄭州後叛變，失敗後何鍵獲得中央支持當上湖南主席達八年之久，湖南軍閥的紛爭才算結束。

註十一：「海上呈幼安」白話解釋。

原詩：『昔年曾見公如佛，今日相看欲欲秋，殘劫已灰三宿樹，清尊不遣陸沉憂，江東才俊斯人在，海上魚龍倦眼收，知否窮山有遺老，白頭燈下說賢侯。』
釋義：當年在醴陵的表現有如活佛，十年後在此重逢，發現你已鬢現秋霜，那次（萍瀏醴）天大的動亂，現在看來只不過火後灰燼。之後，知你曾幾次變換工作，有如驚擾中的烏鵲，不斷變換棲枝。（用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樹三匝，無枝可依……」的典故）。國家仍在內憂外患之中，時有陸沉（亡國）危險。你以酒澆愁，洗不淨內心的憂思。你是江浙不可多得的人才，懷才賦在上海；上海光怪陸離，各種各色的人很多，也許有些看不慣。知道麼，現在醴陵山僻中的遺老，燈前月下，還在講述着，懷念你當年在任上的仁行大德。

註十二：中西文化的衝擊與比較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滿清帝國敵不過西方國家，可以看為當時中西文化「對決」，中國處於劣勢。遜清以後，中國古舊文化隨之破產，新的中國文化仍在摸索形成中。照理中國固有文化的優點應予保存，缺點應該揚棄；西洋及東洋文化的優點應該吸取，缺點應防止；使中國以文化為導向而走上富強康樂之道。事實上一方面由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理想的決策迄未產生。而操國柄者對文化政策的措施以往未盡理想。以致有一長時期的浪費。評論如後。

起源基礎的分析：中國文化起源于陰陽八卦，易經，五行生剋；為籠統的，抽象的，概念的；注重觀察，採取近似而不完全的歸納手法。偏重經驗與方法，缺乏邏

輯推理；易發展為玄學和哲學。因缺乏求真務實精神，容易走上「權變」與「迷信」的道路。西洋文化淵源于古希臘幾何，邏輯追求真理的精神，影響之下發展為近代科學。古中國文化崇尚「道」，可解釋為「最佳途徑與方法」，有時流于「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西洋文化以「求真理」為理想目標。故社會上比較重視誠實，講原則；規則易為大眾遵守。「道」與「真理」可能是中西文化上的基本差異，兩相近但本質不同。中國人比較重視「至性」，可能也是上述文化淵源所致。

文字的影響：中國文字由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為單字單音，字形有優美的規則，宜于詩詞韻文的組合。因以語言趨向文字，故為‘收斂性’的，融合的，概略的，易于形成大一統的語文和文化。西方文字為拼音文字，字形長短不一，多為複音字，宜于歌唱，文字按方言拼造，故為‘發散性’的，開放的，音韻精準的，複雜的，易于產生多樣多變、日新月異、的文化與文明，因為中國文字的特色，產生詩詞歌賦。其優美性非西方文字所能及的。但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耗費了太多于文字的彫琢，忽略了理則性的發展。使理論科學為之偏枯，或有其原因。

民族形成的影響：中國民族是飽經憂患戰亂由多種民族融合而成的巨大民族；容忍程度大，適應性強。但也存在多種複雜因素，急待以共同的新文化來融合固結。

宗教和道德觀念：舊中國文化，因受儒家思想及對神祇與祖先的崇拜影響，形成一種類似宗教式的道德觀。與西方文化中的宗教道德觀頗多相合。道德觀念的存在為國民的自我約束，有利於紀律與秩序的建立及政令的推行。為新文化中的要素。舊中國文化中對神祇的祈求，多以個人「福祿壽喜」為目的，與西方基督教義中「博愛」精神異趣，值得注意。

中國新文化的建立原則：1. 應加強邏輯析理，戒除迷信，虛偽，欺假，武斷。2. 加強國民道德，崇尚誠信，減少權謀巧詐之風。3. 精準周密實事求是。4. 加強國民愛國心與團結性。5. 提高教育水平、加強民主法治觀念。



